

# 北魏太武帝时期平城 “西宫”和“东宫”

□ 卢继文

北魏是南北朝时期，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年）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随着拓跋鲜卑统一北部中国的步伐和政权的日益稳固，逐步建起了适应皇帝办公、生活的皇家宫殿，到太武帝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宫殿群；北魏平城也建设成为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都市，在中国城市建筑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平城的位置大体位于今山西大同市境内的城区及南郊区的一部分。迄今一千六百年以来，历经东魏、北齐、隋、唐、五代和辽金元明清各个朝代，城址没有变动，这在国内是少有的。长期以来，由于北魏平城遗址在今天大同市城区繁华地域范围内，地表存有大量的民居和各类现代建筑，致使城市考古调查极为困难，尽管平城遗址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发掘出了像北魏明堂遗址这种大型建筑遗址，取得一定成绩，但这一遗址全貌至今尚未完全勘探清楚，宫城如何布局，宫城、外城、郭城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始终成为困扰考古学者的问题。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许多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猜测性。本文试从文献中探寻有关记载，分析太武帝时期“西宫”与“东宫”宫殿群的称谓与规模，如有些许收获，为研究北魏平城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认识方法，则不胜荣幸。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一、关于西宫

### 西宫的“称谓”

从历史渊源来讲，汉代就有“东宫”、“西宫”之分别称谓。东宫专指皇帝母亲皇太后或祖母太皇太后的宫殿，西宫则专指皇帝办公和居住的场所。所以从汉代留传下来“西宫”即专指皇帝办公居住场所，成为含有政治意义的专用名称，而非后来朝代演变

后的“东宫”、“西宫”之意。

我们认为，北魏平城时代的宫殿的名称，最早是沿用汉代“西宫”的称谓，专指皇帝拓跋珪在都城内办公居住的场所，即谓皇宫，并无地域或方向的概念。这种认识，基于以下文献记载。一是道武帝于公元398年在平城定都时，其母亲献明太后在皇始元年（396年）已崩，所以不存在其母在“东宫”摄政或其他干预政事的活动；二是当时并没有东宫太子的称谓，即使到了天兴六年（403年），拓跋嗣封齐王，拜相国，加车骑大将军<sup>[1]</sup>也没有明确太子制度，所以还没有建设独立东宫。三是在与北魏政权时间非常接近的后赵石虎政权，其皇帝办公居住的宫殿也称“西宫”。《魏书》中有“虎使其太子宣及宣弟秦公韬递日省可尚书奏事。宣恶韬倖己，谓嬖人杨柯、牟成等曰：‘汝等杀韬，吾入西宫，当以韬之国邑分封汝等。韬既死，上必亲临，因行大事，亡不济矣。’柯等许诺，乃夜入韬第而杀之。”<sup>[2]</sup>的记录。

将“西宫”作为皇帝办公居住场所的称谓使用，一直到太和年间才有了重大改变，在孝文帝南伐途中，决定迁都洛阳的决策公布以后，《魏书》、《北史》始将平城的宫殿称之为“平城宫”<sup>[3]</sup>。这应是为了与新都洛阳的宫殿名称相区别开来的新名称使用的开始。我们认为这是史学家符合历史情况的真实记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平城宫”是北魏平城时期在平城的宫殿的泛称，而非某一个单体宫殿的称谓；酈道元在《水经注·浑水条》中记述的是如浑水流经“平城宫”的部分宫殿，并非“平城宫”建筑的全部，但其中包括了原“西宫”的一些建筑。

### 在平城建设西宫缘由

首先从历史上来分析。从拓跋力微时代开始，拓跋鲜卑就有已经在大同地区活动的历史。沙漠汗北

归,力微“大悦,使诸部大人诣阴馆迎之”<sup>[4]</sup>,穆帝时即公元310年,“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陞北之地。琨自以托附,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与陞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sup>[5]</sup>,大同盆地第一次正式划入其版图。三年后“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湟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脩镇之,统领南部”<sup>[6]</sup>,对“故平城”有过一定程度的修缮和使用历史。东晋咸康四年,即北魏建国元年,“帝即位于繁峙之北。……,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众职。东自湟貉,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夏五月,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湟源川,连日不决,乃从太后计而止”<sup>[7]</sup>。此段记载明确告诉我们,在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在繁峙之北(今山西浑源西)即代王位后,就设想在此地域内定都,建立拓跋鲜卑从未有过的中原汉族皇帝式的城郭和宫殿,充分说明了当时对这一区域地理位置的重视程度和认可;但被其母平文皇后以“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功。”<sup>[8]</sup>的理由所止。我们认为,当时拓跋氏及其领导的部落集团,正是由游牧生活向半游牧半农耕生活转变的初期,绝大多数人不能适应这种生活的急速转变,再加上政治基础尚未稳固,经常性地巡幸四方,可以抚心安民,否则部落容易离心离德,甚至背叛而去,所以在公元340年又“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sup>[9]</sup>,回到了原来的定居地。从此,筑城郭,起宫殿,就成为拓跋鲜卑追逐帝王之都的一个梦想。

其次,从地域上分析。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必定是依山傍水来选择城址,在当时拓跋鲜卑占据的地域当中,平城的中心位置和战略地位非常突出,唯当时大同盆地是较为合适的选择地。“修故平城以为南都”说明穆皇帝猗卢时期就是认可的;而且又有鲜卑族多年在此生活和经营的基础,如浑水和武川水两条河流也能满足当时用水的需求,既符合当时政治条件和军事要求,又圆了拓跋鲜卑多年来的追求和梦想,所以60年后选择平城都城于此。

第三,从时间上来看,这一时期建设的被视为仅“门阙高十余丈”这样宏大的皇宫建筑工程和皇家林苑工程、引水工程、城市规划道路建设,是在同一时间内用30日就完工的。如果平城的皇宫建设没

有完成,却在同一时间另外搞大型建设,时间上是不允许的。《魏书》“天赐三年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湟南宫,门阙高十余丈”<sup>[10]</sup>的记载,明确说明拓跋鲜卑在平城建设中,筑起能够体现皇权威严的十余丈高门阙的宫殿,只有这一处,具有唯一性;不可能在同一区域内修建两处规模很大的皇宫。

此后时间里,除了“泰常五年夏四月,丙寅,起湟南宫”<sup>[11]</sup>“泰常七年,秋七月,乙巳,幸湟南宫”<sup>[12]</sup>的两条记载。《魏书》、《北史》在有关宫殿建设中再也没有出现这一名称,而且也没有皇帝巡幸、出入此宫殿的记载,在没有都城迁移之类事情发生的情况下,显然是名称的使用发生了变化,而非其他。

第四,《魏书》的出版说明,对此书的编纂有很好的介绍。“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由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后崔浩、高允继续编写《国史》,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李彪参加编史,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高祖、世宗、肃宗三朝起居注。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高洋命魏收编写《魏史》,天保五年秋完成纪传,十一月又成十志”<sup>[13]</sup>。据此,“十志”迟于纪传的完成。纪传是几代人早已编写的志书,魏收在极短四年内,显然对平城宫殿不可能有郦道元那样现场踏勘的经历来发现错误并修正错误。而在“志书”中出现的平城宫的宫殿名称,笔者认为当是作者为后人对前朝宫殿及名称的泛用,有混淆的嫌疑,不能作为前朝(北魏)时期宫殿名称使用情况来判断和分析,否则,会影响我们正确分析平城时期宫殿名称的命名、使用和各种时代特征的。特别严重的是,把“天赐三年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西宫,门阙高十余丈;”误记成“天赐三年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湟南宫,门阙高十余丈。”明明都在平城的建设,如何突然冒出建湟南宫阙?假使真的是为“湟南宫”建宫阙,而此后再也没有建设西宫门阙的记载,则西宫建设的形制是不完整的,不符合当时宫殿建设的标准。在建设程序、完整性等方面缺乏逻辑思考。

#### 西宫的建设

西宫的建设经历了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两位皇帝约26年(398—424年)的初建、扩建时期,到太武帝即位时,西宫已具备了相当规模,功能基本完备。

道武帝从“天兴元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sup>[14]</sup>,建设平城。而作为西宫建设

开始的标志建筑,是“天兴元年冬十月起天文殿”<sup>[12]</sup>。从这一年到天赐三年(406年)长达8年的时间中,“西宫”建设包括天文殿、天华殿、天安殿、中天殿及云母堂、金华室等“天”字号宫殿,以及西武库、太庙、紫极殿、玄武楼、凉风观、石池、西昭阳殿、板殿等单体建筑或单元体建筑。与此同时,宫内外还进行了穿沟引渠的水利工程建设。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在天兴元年冬十月辛巳,……筑西宫<sup>[13]</sup>。“十有一月,上幸西宫”<sup>[14]</sup>这两条记载中的这个西宫,在“筑”的建设时间上只用一个月;而对比“天文殿、天华殿、中天殿及云母堂、金华室”<sup>[15]</sup>等“天”字号宫殿的建设时间,最短的也用了三个月,所以我们认为“筑西宫”显然不是建筑一个单体的宫殿建筑,极有可能“筑”的是简易工程,可以理解为利用原有的墙垣基础来修筑宫垣墙。如果这一分析正确的话,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判断,“筑西宫”的简易工程,就是在原有的汉平城的基础来修筑宫垣墙。

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建工程和城建工程。“天赐三年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灋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sup>[16]</sup>。这段记载包含了以下内容:其一,皇宫此前没有门阙,在此大规模建设中,筑起了皇宫的标志建筑——门阙,表明此时已完成西宫建设,初具规模,而且这次工程一并建设了宫内宫外的园林苑囿;其二,规划设立外城,而且在这个“外城”中分别设置“市”和“里”,做到了交易和居住的井然有序;完成了“外城”的道路建设,形成了“经涂洞达”的道路格局。这里记载的筑“灋南宫”,应该就是专指皇宫,否则不会有高十余丈门阙。联系前述的宫殿、宫垣的营建,此时初步已完成了皇宫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程体系。

对上述引用的文献资料分析发现,道武帝先将主要精力和人力物力用于军事目的,尔后才是皇宫和都城的建设。其时间顺序和工程内容的安排,符合当时政治环境与经济建设能力的条件和一般规律。在工程建设上,按照事先做出的整体规划,首先建设满足皇帝基本需要的各个宫殿,其次利用汉平城墙垣来修筑宫墙,然后再筑皇宫的标志建筑门阙;接下来落实规划中的外城,分别设置“市”和“里”,满足了人们生活的一般需求,符合统治者希望的井然有序,同时完成了“外城”的道路建设,形成了“经涂洞达”的道路格局。至此,道武帝对皇家宫殿、外城及城市道路的规划得到具体落实,为日后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战争的进行,迁入平城的人口不断增加,尤其是进入皇宫居住的人口也相应增多,于是明元帝在“泰常八年冬十月癸卯,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sup>[17]</sup>。扩建西宫,起筑西宫的外垣墙,与前述“筑西宫”相衔接,说明原来已经筑起的宫殿群和宫墙,在明元帝看来,已经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且他也不会忘记他父亲道武帝就是被其弟拓跋绍“逾宫犯禁”而暴崩的<sup>[18]</sup>;此次明确地说是起外垣墙,而非垣墙;规划的外垣墙周回二十里,与“规立外城,方二十里”的规模相当。可见,此时在明元帝的理想中,西宫应为有二道墙垣、周回二十里的庞大的宫殿群,但工程是否完工呢,分析结论是否定的。理由有三:一是下令“广西宫,起外垣墙”后的“十有一月己巳,(明元)帝崩于西宫”<sup>[19]</sup>,工程极有可能被迫停工。二是如果西宫的外垣墙完工的话,则此宫墙周回二十里,与“规立外垣,方二十里”的规模相加周回有四十里,就超过了郭城周回三十二里的规模,显然,在地域规模条件上不能成立。三是太武帝即位后,没有完成工程的文献记载;而且他本人曾对群臣建议“更峻京邑城隍,以从周易设险之义,又陈萧何壮丽之说”<sup>[20]</sup>不以为然,批评道:“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sup>[21]</sup>。由于太武帝所坚持这一立场,所以将主要精力用于“扫统万,平秦陇,剪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sup>[22]</sup>的统一事业,对西宫的建设只是对其出生地的“故东宫”进行改建和扩建,所以文献中也就没有其他的记载。

#### 西宫规模和布局

文献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太武帝时期西宫的规模与布局,但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星的记载发现端倪,并做一些相应的分析和判断。

1.从“东宫成,备置屯卫,三分西宫之一”<sup>[23]</sup>分析,西宫占地规模约是东宫的三倍之多或三倍以上。

2.《魏书·列传第八十九吐谷浑》中记载了“慕璿……寻讨禽赫连定,送之平城,世祖嘉之”<sup>[24]</sup>,而慕璿则索要土地和财物以及人员,于是拓跋焘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出席会议的太尉长孙嵩及议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坚持不予的态度。“世祖诏公卿朝会议答施行。太尉长孙嵩及议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议曰:……”<sup>[25]</sup>《魏书·帝纪第四》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延和元年(432年)三月至五月之间,而在前一年的九

月,世祖加太尉长孙嵩柱国大将军,特进、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智如崔浩,廉如道生”<sup>[26]</sup>的两位重臣,尤其是“世祖世,所在著绩,每建大议,多合时机”<sup>[27]</sup>的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的意见,却没有记录,反而把赞同长孙嵩意见的议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这些小人物的记载下来,充分说明这次会议上是有反对意见或保留意见的。我们认为出席延和元年这一次会议人数的记载,表明当时可以容纳几百人以上甚至上千人开会的大体量的宫殿建筑。可以想像这样宫殿的室内建筑面积,至少应该在三千平方米以上,而这个宫殿的占地面积就更大了,至少是建筑面积的两倍以上。如果能以此类推,则“西宫”内的建筑仅天文殿、天华殿、天安殿、中天殿及云母堂、金华室等“天”字号宫殿和太庙、紫极殿、西昭阳殿、板殿等建筑的占地面积合计就可能应该在数万甚至十数万平方米以上。

3.除了上述的主要的宫殿建筑,还有《南齐书》记载的“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库土屋一十余间……太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sup>[28]</sup>等宫内的库房就有百间以上。这些武器库、丝绵布库、粮库、铁及木的作坊,占地面积又该是多少呢?我们以为,当在上万平方米甚至更大。

4.《南齐书》对北魏皇帝的用车有这样的记述:“其车服,有大小辇,皆五层,下施四轮,三二百人牵之。”<sup>[29]</sup>南朝使者亲眼目睹的事情,回国后告诉了人们,才会记入历史文献当中。依当时双方敌对的关系分析,对方没有必要夸大或献媚于北魏,所以这一记载的可信度极高。这样高大的车辆,进出西宫,则对道路要求非同一般,同时也说明宫中的服务人员数量非常之大。以此推论,东宫“婢使千余人”<sup>[30]</sup>,当属确切;反过来说,西宫的服务人员数量应在三四千以上。满足这些服务人员的住宿要求的房屋面积又该是多少呢?我们以为,当在上万平方米以上。

而满足上下“五层,下施四轮,三二百人牵之,”的车服出入西宫要求的道路又该是多宽、多长呢?我们以为,西宫内的主要道路宽度当在三五十米以上,长度必须从宫外御路直达主要宫殿前。这样宽窄不一的宫内道路占地面积又该是多少呢?西宫内的各种建筑占地面积又该是多少呢?

在无确切的考古资料的今天,列举2005年我们对大同古城民居街巷调查两个数据作为参考,即街巷的占地面积约为古城总占地面积3.26平方公里

的49%,各类建筑约占总面积的51%。

综上所述,西宫占地面积极有可能在百万平方米的范围甚至更大,西宫的规模非常之大,远远超出了一些人的想象。

有关西宫的布局,我们以为首先是其主要的标志性的建筑,有多组的宫殿群,如天文殿、天华殿、天安殿、中天殿及云母堂、金华室等“天”字号宫殿和太庙、紫极殿、西昭阳殿、板殿等殿宇,以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建筑物(包括后来称之为万寿宫的一组宫殿群),共同构成宫内的主要建筑体系;其次是武器库、丝绵布库、粮库等各类库房,铁及木的作坊和奴婢下人们住宿的房屋,再有就是马厰牛圈,这些可以看成是次要建筑体系;第三是宫内的道路和广场;第四是类似“华林园”<sup>[31]</sup>的休闲场所。这样的西宫,确实是“歌台舞榭,月殿云堂”<sup>[32]</sup>。

#### 西宫中的万寿宫 故东宫

在《魏书》中有“世祖太武皇帝,讳焘,太宗明元皇帝之长子也,母曰杜贵嫔。天赐五年生于东宫……”<sup>[33]</sup>的记叙。我们认为这个“东宫”,最初是西宫建筑群中供人居住的一座普通宫殿,如同“天安殿”那样,是没有详细记载建筑时间或建筑名称的建筑;类似的建筑,当时应该说为数不少。由于拓跋焘后来在“泰常七年四月,封泰平王,五月,为监国”<sup>[34]</sup>,进而“总摄百揆”,才在之后的《魏书·太武帝纪》中被称为“东宫”。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于“始光二年三月庚辰,营故东宫为万寿宫,起永安、安乐二殿,临望观、九华堂……秋九月,永安、安乐二殿成,丁卯,大飨以落之”<sup>[35]</sup>。显然原来的规模并不大,扩建后的万寿宫是以永安殿、安乐殿为主体建筑,临望观、九华堂为附属建筑的小型宫殿单元体,它在“西宫”之内,是西宫宫殿群当中的一部分,而非后来真正意义上的“东宫”。

围绕万寿宫宫内的两个主要历史事件,可以说明“万寿宫”这个小型宫殿的单元体,是一个较为封闭、易于控制的宫中之宫。一是文成皇帝在“万寿宫”中的永安殿登基即位。二是以献文帝拓跋弘禅位后主要居住地来分析,他当时主要在西苑的“宁光宫”和“鹿野佛图岩房”读书参禅,回到皇宫后也无法居在象征着政治权力中心的西宫内的主要宫殿。承明元年,献文帝拓跋弘“崩于永安殿”。他死在万寿宫这座小型宫殿单元体的永安殿内,直接表明了他被废黜与权力中心之外以后的真实情况和尴尬地位。

真正意义上和形式上俱能称之为东宫的,应该

是在“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尊保太后为皇太后，立皇后赫连氏，立皇子晃为太子”<sup>[33]</sup>之后的“延和元年秋七月，筑东宫”<sup>[37]</sup>开始建造的“东宫”。

## 二、关于东宫

### 东宫的建设规模

东宫的建设，《魏书》记载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公元432年至434年，从延和元年七月起“筑”，到“三年七月，东宫成，备置屯卫，三分西宫之一”<sup>[38]</sup>，工期前后整整用了二年时间，超过了文献记载的任何一项工程，可见其规模之大，功能之完备。施工项目应包括主要宫殿的营造和其他宫殿的兴建以及筑起宫垣墙。第二次是公元450年，“太平真君十一年春正月，……是月，大治宫室，皇太子居于北宫”<sup>[39]</sup>。两次修建的时间间隔十八年，原因只能有两个，一是“太平真君五年春正月壬寅，皇太子始总百揆。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郡公崔浩，侍中、广平公张黎，侍中、建兴公古弼，辅太子以决庶政。诸上书者皆称臣，上疏仪与表同”<sup>[40]</sup>。从这时开始，太子晃已经监国，日常主要政务活动在东宫内进行，东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于是对东宫翻建和修饰，以显示储君地位。二是房屋质量较差，确实需要“大治宫室”。

关于东宫的规模，我们做以下分析。从政治意义上来看，“东宫成，备置屯卫，三分西宫之一”的记载，说明拓跋晃储君地位，在其父太武帝拓跋焘的心目中是多么重要，否则没有必要拿出屯卫西宫兵力的三分之一来“备置屯卫”东宫，所以最初它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建筑就不会狭促。从地理意义上讲，要满足两个大规模的宫殿群的建设用地，就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东宫势必要与西宫分置，而单独建设。所以我们认为东宫是与西宫分置而治的另一个宫殿群，即不在同一区域的两个单元。东宫的区域规模大致应为西宫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东宫系统内部本身还有次单元体建筑。

除了上述对《魏书》记载的分析，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了解东宫的规模和建设。《南齐书》记载的“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sup>[41]</sup>“伪太子别有仓库”（此仓库有别于西宫的各类仓库，笔者注），对东宫的规模描述则更加具体。让我们认识到，东宫的占地面积是很大的。

一要有满足太子、妃妾和其他服务于太子的官僚们使用、居住的各类房屋面积；

二要有满足“婢使千余人”的生活、居住的面积；

三要有满足织绫锦，酿酒的“工作间”、“原料库”和“成品库”所需要的建筑面积。东宫“织绫锦”、“酤酒”是为了贩卖逐利，牟取商业利益，其商业生产的建筑面积就远远大于为满足自己生活需要而设置的建筑面积，一般人家在家中也能完成的事情，这里显然不行，否则无法完成牟利的目的；

四要有适合“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养殖业和种植业的生产场地。

我们以为仅满足太子、妃妾和其他服务于太子的官僚们以及婢使千余人生活和生产的各类房屋面积，就极有可能超过上万平方米甚至更大，否则无法满足需要；再加上这些养殖、畜牧、耕织生产经营对宫内土地的需求，其占地面积要比日常生活和室内生产的建筑面积，大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是完全有可能的。东宫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初步推断，东宫的占地面积要有上几万甚至几十万平方米。

东宫的布局，《南齐书》已有记述，不再赘言。

## 三、西宫、东宫位置推断的几条线索

分析郦道元在《水经注·浑水条》中“如浑水又南，分为二水。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历诸池沼。又南，经虎圈东，……。又径平城西郭内，魏太常七年所城也。……其水又南，屈径平城县故城南。……魏天兴二年，迁都于此。……”一水南径白登山西。服虔曰：白登，台名也，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城，若丘陵矣。今平城东十七里有台，即白登台也。台南对冈阜，即白登山也。故《汉书》称上遂至平城，上白登者也，为匈奴所围处……。其水又南径平城县故城东，司州代平治。皇都洛阳以为恒州”等几则记述，北魏平城西宫的宫殿最初是在汉平城县址的位置上兴建的，当宫内地域条件不能满足需要时，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建而发展的。

关于东宫的位置，我们不妨认真地梳理以下的线索。其一，“（太平真君）十一年，春正月，是月，大治宫室，皇太子居于北宫”<sup>[41]</sup>。因平城地处北地，北魏定都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京师大风，扬沙折树”，“京师暴风，宫墙倒，杀数十人”<sup>[42]</sup>等极坏的天气多达十余次。避开正在施工的宫殿，居住在上风向的北宫，显然是最为合适的。可见东宫的位置应在北宫的下风向，即北宫之南面。其二，《南齐书》对东宫位置的

记载是“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四角起楼”。这个“城东”存在两种解释,一是在城内之东,一是在城外之东。是哪一个“城”呢?魏书对“城”的记载有“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明年六月,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等。我们认为,“都城”则是北魏平城的总称,包括在汉平城基础上兴建的西宫所在的“内城”以及“外城”;外郭是都城最外面的城墙;这里的“外城”是专指区别于在汉平城址上兴建的皇宫的内城的“城”。显然,东宫位置极有可能在汉平城基础上兴建的“内城”城外之东的区域内,否则没有必要再开四门。其三,我们从《魏书·列传第三十六高允》中发现西宫与东宫距离的信息。“初,浩之被收也,见直中书省。恭宗使东宫侍郎吴延召允,仍留宿宫内。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宫门”。正是这种“驂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驂”:即一车驾三马。《诗·小雅·采芣》中有:“载驂载駟”。“驂乘”,按《辞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的解释,即古代乘车在车右陪乘的人。《汉书·文帝纪》中有“乃令宋昌驂乘”的记载,颜师古注:“乘车之法,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是以戎事则称车右,其余则称驂乘。”依此,我们这样推测:东宫、西宫应有一定的间距,否则没有必要使用三驾马车;而且西宫、东宫有各自的宫门。其四,上世纪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发现的认为有可能是宫殿遗址的区域,即现在北关火车站北附近,是我们关注的重要地区。我们注意到此区域内的两个地名“北宫房、南宫房”,在上世纪40年代名称依然是“北宫房、南宫房”,后来才变为“北官房、南官房”。其位置在上世纪30年代的水野清一发现的宫殿遗址以南,范围包括西、南均至铁路沿线,东至站东大街;而东面的这条线与操场城东城墙恰恰为一条直线。所以综合上述的分析,我们推断东宫的位置可能是北苑之南、汉平城基础上兴建的“内城”城外之东的区域。

#### 四、结 语

西宫是在最初的皇帝办公居住场所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包括多个单独的单元体的皇家宫殿群,它包括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的部分宫殿建筑。西宫应在汉平城县城址,范围较大。

故东宫伴随着拓跋嗣建立太子制度而建设,首先由拓跋焘居住,拓跋焘继任皇位后,改名为“万寿

宫”,是西宫内众多宫殿群中的一组。

东宫是拓跋焘为其太子拓跋晃另建的宫殿。东宫是在西宫的功能、规模等方面的条件,尤其是政治条件不能满足时,另外建造的另一组宫殿群,它与西宫是两个独立的单元体。

两宫之间有相对的空间。

两宫的建设为日后平城宫殿完整形成奠定了基础。

[1]《魏书·太宗纪》,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3页。本文所引用的内容《北史》与《魏书》相同,故《北史》的记载不再一一列举。

[2]《魏书·列传第八十三羯胡石勒》,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89页。

[3]《魏书·灵征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61页,有“神鼎二年六月甘露降于平城宫”的记录。

[4]《魏书·序纪》,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页。

[5]同上,第5页。

[6]同上,第6页。

[7]同上,第8页。

[8]《魏书·皇后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16页。

[9]《魏书·序纪》,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页。

[10]《魏书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

[11][12]《魏书·太祖纪》,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页。

[13]同上,第27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2页、第23页、第24页。

[16]同上,第28页。

[17]《魏书·太宗纪》,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2页。

[18]《魏书·道武七王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61页。

[19]《魏书·太宗纪》,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2页。

[20][21]《魏书·世祖纪》,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2页。

[21]同上,第72页。

[22]同上,第73页。

[23]同上,第57页。

[24][25]《魏书·列传第八十九吐谷浑》,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513页。

[26][27]《魏书·列传第十三长孙道生》,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33页。

[28]《南齐书·列传第三十八魏虏》,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 670 页。

[29]《南齐书·列传第三十八魏虏》，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670 页、第 671 页。

[30]《南齐书·列传第三十八魏虏》，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670 页。

[31]《魏书·灵征志八》有记“世祖真君五年八月，华林园诸果尽花”。推测此华林园在宫内或靠近西宫。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1945 页。

[32]《文苑英华》卷 45 吕令问《云中古城赋》。

[33] [34]《魏书·世祖纪》，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47

页。

[35] 同上，第 48 页。

[36] [37] 同上，第 54 页。

[38] 同上，第 57 页。

[39] 同上，第 70 页。

[40] 同上，第 65 页。

[41] 同上，第 70 页。

[42]《魏书·灵征志》。

(作者工作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文物局)

(上接 39 页)

看到的部分纹样, 写实性的动物由一根缰绳拴在图案化的树木上。也有打破三维空间的限制, 不再按比例确定各物体大小。还有以树纹为中心左右配以具象的动物与抽象的图形。当然还有一些动物图形也出现了一定的装饰性倾向, 开始强调外形的线条变化。显示出齐人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和无拘无束的创作态度。这种手法, 既有具体直观的形象创造力, 也有与之相适应的抽象的思维能力, 是齐瓦当纹饰由写实性走向装饰性的过渡, 表现出人们创作态度的转变, 逐渐由题材上的自由转向形式上的自由。

#### 东周齐国瓦当的延伸与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瓦当带有鲜明的齐文化色彩, 是临淄地区民间匠人集体的智慧的体现。其特有的内容、新颖的构图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影响了齐国周边受齐化的地区和秦汉时期齐地所发现的瓦当。在瓦当发展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齐国瓦当纹饰的艺术价值有装点堂庑, 美化环境的作用, 其艺术图案和艺术构思是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 是当时的艺术家汲取生活中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和它搅拌在一起的是他们劳动生活的时代气息, 地域文化风貌以及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不论是题材内容的选择, 还是表现手法, 齐国瓦当纹饰都有较强的民间艺术特征, 还透

露着艺术思维方式的原始性, 是我们探讨古代社会的一份珍贵形象资料, 对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思想史及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 齐国瓦当还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字、书法、篆刻、绘画等方面的宝贵资料, 其独有的中国古代原始味道的纹饰也可为现代的艺术工作者, 如画家、设计艺术家、工艺美术家等提供更为丰富的图案、题材及创作灵感。

齐国瓦当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也是我国艺术百花园中一束绚丽的花朵。

#### 参考文献

1. 张文彬主编《新中国出土瓦当集录》，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 安立华编著《齐国瓦当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 年版
3. 涂书田《寿春城址出土的瓦当》，《考古》1993 年第 3 期，271~280 页
4. 冯慧福《秦汉瓦当源流琐议》，《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1 期，101~103 页
5. 敏泽编著《中国美学思想史》，齐鲁书社 1987 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

山东淄博职业学院艺术设计系)